

### 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

周国平



爱是一份伴随着付出的关切,我们往往最爱我们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对象。

爱,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和不设前提的宽容。人在爱时都太容易在乎被爱,视为权利,在被爱时又都太容易看轻被爱,受之当然。如果反过来,有爱心而不求回报,对被爱知珍惜却不计较,人就爱得有尊严、活得有器度了。

与是否被爱相比,有无爱心是更重要的。一个缺少被爱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则是一个冷漠的人。孤独的人只要具有爱心,他仍会有孤独中的幸福,如雪莱所说,当他的爱心在不理解他的人群中无可寄托时,便会投向花朵、小草、河流和天空,并因此而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可是,倘若一个人没有爱心,则无论他表面上的生活多么热闹,幸福的源泉已经枯竭,他那颗冷漠的心是决不可能真正快乐的。

一个只想被人爱而没有爱人之心的心,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他真正在乎的也不是被爱,而是占有。爱心是与占有欲正相反对的东西。爱本质上是一种给予,而爱的幸福就在这给予之中。许多贤哲都指出,给予比得到更幸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亲子之爱,有爱心的父母在照料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便感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爱情中,也是当你体会到你给你所爱的人带来了幸福之时,你自己才最感到幸福。

对于个人来说,最可悲的事情不是在被爱方面受挫,例如失恋、朋友反目等等,而是爱心的丧失,从而失去了感受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爱心的普遍丧失则是可怕的,它的确会使世界变得冷如冰窟,荒凉如沙漠。在这样的环境中,善良的人们不免寒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因此也趋于冷漠,而是要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仍葆有一颗爱心。应该相信,世上善良的人总是多数,爱心必能唤起爱心。不论个人还是社会,只要爱心犹存,就有希望。

爱的反义词不是孤独,也不是恨,而是冷漠。孤独者和恨者都是会爱的,冷漠者却与爱完全无缘。如果说孤独是爱心的没有着落,恨是爱心的受挫,那么,冷漠就是爱心的毁灭。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它使个人失去生活的意义,使社会发生道德的危机。在我看来,当今社会最触目惊心的现象之一便是人心的冷漠。在一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冷漠会像病毒一样传播,从而使有爱心的人更感到孤独,甚至感到愤恨。不过,让我们记住,我们不要也由孤独和愤恨而堕入冷漠,保护爱心、拒绝冷漠乃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灵魂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份责任。

凡正常人,都兼有疼人和被人疼两种需要。在相爱者之间,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同时在对方身上获得满足,便潜伏着危机。那惯常被疼的一方最好不要以为,你遇到了一个只想疼人不想被人疼的纯粹父亲型的男人或纯粹母亲型的女人。在这茫茫宇宙间,有谁是想要人疼的孤儿?多么纯粹和热烈的爱,只要是人间真实的爱,就必然具有人间性,沾染了人间的烟火味。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真能喜结良缘,日久相伴,两人一定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摩擦。我们都生活在现象之中,都只能通过现象来体悟本质,没有人直接生活在爱的本质之中。如果有谁把自己的生活当作爱的本质展示给人们看,不用说,那肯定是在做秀,而且做得很不高明。

### 重读丁聪为聂绀弩作《老头上工图》

邵燕祥

可敬可爱的前辈诗人聂绀弩在北大荒诗中有“夕阳锄”意象:收工心境,前无古人,略可匹敌者,惟陶渊明“带月(荷)锄(归)”耳。另一可敬可爱的前辈画家丁聪乃当时“北大”荒友,为老聂作《老头上工图》,传神复可传世也。从来天子重英豪,无用书生慢折腰。神笔留声聒聒聒,童心玩味夕阳锄。千秋赤子无邪思,四海骚魂不用招。哀乐到头谁后笑,风吹鬓立老三毛。七月二日,夏历五月十七,乙未贱辰前一日



老头上工图 丁聪作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他和米开朗基罗及拉斐尔三位意大利艺术家号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他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完美代表。他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而且在文学、诗歌、寓言、音乐、建筑设计、军事科学、生物学、地理、天文、解剖学、数学、光学上都有极深的造诣,几乎门门学科无师自通,聪明绝顶。一生求知,钻研而成全才,可称人类历史中罕见的全才。

### 列奥纳多·达·芬奇——世界和平人士之七

他父亲皮耶鲁·达·芬奇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有名的公证人,家境富裕。所以,他关心儿子的教育,幼年小达·芬奇住在祖父的庄园。庄园在佛罗伦萨郊外芬奇镇外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庄园美丽,其父让小达·芬奇从小受环境的陶冶。祖父教他诗歌,小达芬奇聪慧而好学,很小就会唱歌,在颂诗班当领唱,且会弹七弦琴,还会自己作曲填词,使大人们十分惊奇。他常常为邻居、亲友画肖像,人们称他“绘画神童”。

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中一切美妙的神奇的景物。他的一生对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有一次他到野外采集标本,经过一个深山洞穴,洞深而黑,他感到恐怖,却又好奇,要探索洞里有何怪物。他一是怕,二是求知,但最终还是走完了这个恐怖的洞穴。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就像在这两种思绪中的不断探求,许多问题的解答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尤其在绘画艺术方面,那幅自画像像一位哲学家般的睿智长者,那幅《最后的晚餐》,人物画得如此惟妙惟肖。众多人物个个都有生动的表情和传神的动作。他的妙笔使画中人活灵活现。那幅《蒙娜丽莎》少妇的含蓄的微笑,使这幅画成为法国卢浮宫镇国之宝(三大宝之一)。

他父亲认准儿子是个天才,十岁那年,皮耶鲁受一位农民的委托画一幅盾画,皮耶鲁就让儿子试试。小达·芬奇居然在自己卧室内画了一个月,他会采用光的效果,在画面上画了一个妖怪。画好后,他让父亲进卧室,皮耶鲁一进卧室在窗帘底下看到这张妖魔鬼怪画,大吃一惊。孩子却哈哈大笑,向父亲说:“你就送这幅画去吧!”

他不重女色,众所周知,他终身未婚。可是他的人物画,将女性美表现到极致。他对一切生活中的美,都要用艺术来表现。他甚至总结艺术绘画与雕塑可以将生活中瞬间、刹那、昙花一现的美留成永恒的美。如他老师韦罗基奥用青铜雕塑的那幅大卫像,就是达·芬奇青年时做的模特儿,永存的美留于人间。

父亲在惊奇中,决心把他送到当年佛罗伦萨最有名望的大画家韦罗基奥处学绘画。韦罗基奥当年在佛罗伦萨办了一个艺术作坊,实际上就是一个艺术中心,一个聚集了大批画家、科学家、人文主义者的沙龙。他在这个艺术环境中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到20岁时,他已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又善于思考、钻研问题,所以不久在各部门学科上都成为了尖子。从此,他的画笔和雕塑刀不断地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中的真善美,热情

达·芬奇的许多作品很受米兰大公罗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青睐,所以,大公请他两次在米兰宫廷任职。1499年他为避战乱而到曼图亚和威尼斯旅游,从事科研工作。1500年回到故乡,开始画《蒙娜丽莎》。不久,受聘于威尼斯任军事科学工程师。1513年移居罗马。在罗马时他见到了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但他没有显露自己的才华,很多人还误会他是位巫师。1515年他迁居法国,最后定居布瓦。他晚年极少绘画,专心科学研究。三年时间写下包罗万象的笔记、读书札记,涉及军事、建筑、文学、诗歌等等约7000多页。他真是旷世奇才,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留下了稀世瑰宝!

抗日战争刚刚落幕,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不计其数的书籍记载和诉说了这段民族的悲惨历史。在一部部恢弘巨作之外,有一本薄薄书,不起眼的小册子,描述了作者在与战火纷飞、的乱世见闻,这便是郑振铎的《蛰居散记》。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文学史家,抗战期间在上海投身爱国救亡斗争。1941年上海租界全部沦陷后,郑先生不得不化名隐居,1943到1945年一直蛰居在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僻静小巷。身处乱世的郑先生深感受日如岁,这几年目睹了抗战沦陷区的乱世百态,期间既有朋友志士的杀身成仁,也有牛鬼蛇神的跳梁小丑。郑先生以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将这段黑暗蛰居生活所闻目睹的事实记录下来,成为描述抗战时期上海租界众生相的一幅浮世绘。

法文豪都德的《最后一课》在我国家喻户晓,然而,在《蛰居散记》中也有一个在中国抗战史上“最后一课”的故事,篇幅短小精悍,却让后人感受到抗战史上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和爱国热情。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当时在上海西郊真如地区的国立暨南大学校舍被夷为废墟。同年8月起,暨南大学不得不迁入相对安全的英法租界。新校址占地面积不足原校区的十分之一,非常狭小,暨大师生同仇敌忾,艰难办学,这段时期也成为暨大校园史上的“孤岛”时期。1941年12月8日清晨,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来电是位好友,告知日军已于昨夜击败英法军舰,正从虹口及郊外陆续开进,占领租界。郑先生心急如焚地赶往学校。

校长和重要负责人均已到齐,大家召开了一个简短而悲壮的会议,决定“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上课。”学校照常摇铃上课。郑先生都镇定,安详,没有紧张和焦躁。校园里十多个教室都是如此,老师们恋恋不舍三尺讲台,学生们则抚摸着课椅的扶手,或用铅笔、钢笔涂写着即将离别的字句。

### 中国抗战史上的“最后一课”

汪洋

教室里只有怀表的滴答声可以听见,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几分钟后,该来的还是来了。10时30分,几辆载满日本兵的军用车,由东向西经过校门,车头一面血红的旭日旗,在日光下格外刺眼。郑先生挺直了身体,盖上书本宣布“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起立,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只有几位女生在低声啜泣。学生们没有什么要问的,大家自觉地各自行动,像钢铁一般迈着坚定的步伐。七十年后,笔者再次到静安区康定路528号暨南大学旧址。当年的校区已经不复存在,书中人物也难以寻觅。在暨大

今年是五卅惨案发生九十周年祭。不久前接到龙华烈士陵园的第二封来信,告知我陵园内被错立的五卅惨案雕塑碑文已经改正,那纠结于心十多年的悬案总算解决了。

十年前,我发现龙华烈士陵园内的五卅惨案雕塑碑文有误。五卅惨案发生于1925年。起因是当年凶恶的日本纱厂主无辜枪杀青年工人顾正红,引起了群情愤慨。而后,英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又开枪射杀为此而抗议的人群,造成大量伤亡。蔡元培先生特意为死难烈士墓撰写了碑文。但建墓仅十年,侵略者的日寇于1937年横蛮侵占上海。为掩盖罪行,不惜毁墓灭迹,把烈士墓和墓碑全给炸毁了。1998年龙华烈士陵园初建时,便建有纪念五卅惨案的雕塑和墓碑。其碑文即是蔡先生当年所撰而移镌的。可叹的是蔡先生的文章被炸毁了。

依我所见,在新碑上我发现有以下四处错误:(一)将激昂悲壮误作激“昂”悲壮;(二)将北洋系军阀误作北洋“係”军阀;(三)将压制罢工误作压“製”罢工;(四)将前仆后继误作前“僕”后继。毫无疑问,这篇文章作者既然被冠以蔡先生之名,则蔡先生难辞“白字先生”之“美名”了。

面对发现的这一错碑现象,该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告知所在单位,提请改正。但自付以一介草莽衰朽,谁会来听你的逆耳之言?再想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明训,这里“在其位者”会来谋其政,尽到保护之责的,何劳你这个“不在其位者”瞎操心!我想还是等等看吧。非常不幸,等了十九年,还是依然故我,而我已到风烛残年,想到“人亡政息”这四个字,我想在这方面总得留点“息”在人间。于是我采取走访访之路,写了一篇《期待》小文给市里,市又转民政局,局再转到烈士陵园。也许是碍于必须在若干天内作出回复的规定,我终于收到了陵园方的第一封回信。

在这封回信里,首先是回复对我提的“四点错误”作辩白。承认三处(係、製、僕)是“使用不妥”,而还有一处是正确的(激昂)。据告现碑文中的“昂”字,“为唐代欧阳询楷书‘昂’的写法,因此‘昂’是正确的。信上还翻印了碑文上的‘昂’和欧阳询碑帖上的‘昂’,作为两相对照,证明‘真实不虚’。至于修碑的问题,说:如局部修补,会影响整体观感,但如整体翻修,则不具备时机。这一答复,无异简单的一句话:“不修了。”事情到此,似已终结。

老朽学识浅陋,对书法更是一窍不通,但如今返回来的信息,是有关书道的高深理论,使我似懂非懂,一知半解。我很羡慕陵园方的告知,他们拥有众多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文字专家和书法专家,可随时咨询。我为了破解欧阳询的楷书“昂”就是“昂”的“高论”,因折足初愈,不得不拄拐杖,挤公车,去淘欧阳询的碑帖。寻寻觅觅,来来往往,感恩上苍,我有幸买到两本欧阳询的楷书碑帖:《皇甫诞碑》和《温彦博碑》。而且庆幸的是这两本碑帖里面,都有个“昂”字。我专心研读了有关“昂”字及其上、下文,得知“昂”的确切意义是“天上的一个星辰,而绝无与‘激昂’有关的意思。如《皇甫诞碑》:“才兼燕相,降昂纬之淑精。”在《温彦博碑》:“若夫昂宿宿天,感其灵者人杰。”如果“昂”字改成“昂”字,还能讲得通吗?

我觉得我是受骗了……为了深入地了解欧阳询的楷书“昂”就是“昂”的“高论”,我正式给陵园写信,请求给个依据,可迟迟没有答复。

如今,他们已完成错碑内的四处整修,这就是用实际行动作出了最好的答复。就在那次给陵园的信中,我说:“我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给你们写这封信的。我是一名高龄退休职工,我拄杖、带拐杖、挤公交、寻寻觅觅,总算淘到了两本有针对性、可实用的碑帖。我辛辛苦苦,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的是什么?我不想中国文字受此糟蹋,我不想蔡元培先生十七年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昭雪无期,我要为烈士陵园增光而不是抹黑,作为发挥我最后的一点余热而已。”

路人的谈笑声将笔者的思绪拨回现实,眼前的康定路轨交环绕,大厦林立,道路两侧也正在进行着旧里改造工程,以往静安区老城厢的危棚简屋已逐步被现代化社区取代,不远处常德路口华灯璀璨,车水马龙。辞别郑振铎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笔者脚步却更加坚定起来。

年过九旬的老人,被书中的正义所感动,请看本栏。

